



中国民俗研究前沿论丛

中国民俗研究史

王文宝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俗研究史

王文宝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研究史/王文宝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207-05930-2

I. 中… II. 王… III. 民俗学—中国 IV. 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861 号

责任编辑:陈春江 李春兰

封面设计:叶方

版式设计:王宇彤

中国民俗研究史

Zhongguo Minsu Yanjiushi

王文宝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7

字 数 350 000

印 数 1-5 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930-2/K·697

定价: 34.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乌丙安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掀起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冲击下,终于把中国民俗学从醒觉复苏的重建期推向崛起活跃的繁荣期。近 20 年中,无论在民俗调查、民俗研究方面,还是在民俗论著的出版、民俗科学队伍的发展壮大、民俗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跨入 21 世纪门槛的新时期,民俗科学研究的众多耀眼的新成果,更呈现出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新景象。民俗学史家王文宝的《中国民俗研究史》,便是其中令人眼亮的一部新著。

众所周知,王文宝作为民俗科学史的专家,20 多年来他一方面忙碌奔走在开辟当代民俗学发展的道路上,参加民俗学工作实践;另一方面他还辛勤耕耘在民俗学浩瀚的资料“田野”上,探查我国民俗学走过的真实足迹。他在民俗学科史的建立上,一贯坚持“信史”的“三实”原则,使他的史著赢得了学界的美誉和信服。《中国民俗研究史》一书的出版,再一次展现了作者的上述作风和品格。

到现在为止,在王文宝的著作中已经有三部民俗学科史的书出版问世。第一部书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1987 年 8 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8 年后,1995 年 9 月,第二部书《中国民俗学史》由四川成都巴蜀书社出版。时隔 6 年,又出版了这第三部书《中国民俗研究史》。如何看待作者这一三部曲的写作旅程,是一个颇有意义的科学话题。只要对上述三部著作进行一番对照比较,就不

序

中 国
民 俗





难发现其中蕴含的主客观因素。

第一,当代中国民俗学的蓬勃发展,强烈触动了作者的科学撰史的责任感,激发了作者的学科激情。任何一位科学史家都生活在科学不断发展的动态环境中,他的责任就在于密切关注科学的发展轨迹,把最新的科学成果和发展进程忠实地记录下来。王文宝正是这样,紧跟民俗学的发展步伐,把当代民俗学的最新论著和最新动态填写到此后出版的新史册中。这正是《中国民俗研究史》一书对前两部史著的超越;其中,增加了填补空白的许多重要内容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当代民俗学成果陆续被科学实践所检验,进一步调整了作者的史评态度,使作者掌握了客观论史的充分依据。任何一部科学史著作,其论史或评史的内容都不是作者随意或轻率地妄加评论的;作者只能根据科学实践,从反复检验后的实际效果中选取公论或归纳共识载入史册。王文宝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加强了本书的论述与评说,尽可能地使本书的客观评价经得起民俗科学实践的不断检验。

第三,中国民俗学古今实证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强力支持了作者的“三实”撰史的原则立场。实证资料是建立科学史的基础,缺少了确凿的史料就难以保证史书著作的真实可靠性。一位负责任的优秀科学史家总会把史料翔实、史事真实、史论确实作为自己撰史的三原则。《中国民俗研究史》的作者正是一贯坚持这三原则的典范。读者只要仔细阅读本书披露的大量图照插页,就会看到作者在搜集挖掘珍贵的新史料方面的过硬功夫。本书避开了一些民俗书刊上并不准确或近乎讹传的记述,尽力用第一手资料的实证支持本书的立论,使本书比此前他出版的两部史著更具有信史的完整性。在作者撰写本书的艰辛过程中,我国从古到今的大量民俗学资料的新发现,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从而保证了本书的高质量和高水平。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民俗研究史》的出版,标志着中





国民俗学的发展已经走上了新世纪的一个新里程,它预示着中国民俗学未来更大的繁荣将会谱写出更加光辉的历史篇章。

2001 年立秋

注:作者是当代中国民俗学学科理论建设带头人、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

序

中 国
民 俗





序

汪玢玲

一部科学史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信史。信史必撰自信士:据可信史料,并忠于史实的记叙和正确论述。王文宝先生依据“五四”以来兴起的中国民俗学运动及“文革”开禁后民俗学的复兴、重建、繁荣、发展数十年间学事,秉笔直书,煌煌数十万言,给学术界提供了一部重要学术研究文献史,可谓既得其书,亦得其人,书品与人品两相辉映,诚学界盛事也。

披览一部书籍,读者自有品评,不肖序者多言,况乌丙安先生已就产生背景写在前面。我既蒙作者盛情索序,无以拒之,只想谈谈我读此书时之亲切感受和收益,述及些与之有关的书外的人和事,以供读者品味,并可见作者的严肃著述态度、科学方法和崇高的敬业精神。

我与王文宝、乌丙安先生可算是同龄的民俗学第二代传人,我们身处建国初期极左思潮肆虐,人民科学——民俗学惨遭践踏,老一代民俗学者人格受损,民俗学面临灭绝的尴尬局面,莫不心有忧戚,深感不平。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开禁之初,自然怀有一种历史责任感,用各种办法积极为民俗学复兴、发展呐喊,内部上书者有之,公开撰文论争者有之,都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重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民俗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些为民俗学的发难文章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前后,曾被誉为“敢为天下先”的举措,转载到《新华文摘》及国外刊物上,直到老一辈民俗学家顾颉刚、钟敬文等七教授在1979年末





第四次文代会上,也联名上书,提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中央文化部门有关领导的重视,采纳了意见,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中附设了“民俗学部”,1983年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选钟敬文教授为理事长,才又恢复了民俗学活动,于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出现了民俗学搜集、整理、研究的热潮和全国范围文化寻根热的高潮。

一些民俗学新兵和民俗学研究人员,在这场文化热潮中,大多扮演了“临时角色”,采取了“短期行动”,过后就进入常态的田野作业或书斋研究去从事理论工作或专题调查写作了。只有王文宝先生念念不忘于“史”,岌岌于“五四”民俗学运动史料的搜集:写北大歌谣研究会与《歌谣》周刊的出版,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与《民俗学丛书》的发行,以及不时写出“民俗学运动分期”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我们知道他是痛下决心在写“长史”了。

此时,我感到一种欣慰:学界朋友中王文宝最适于写史了。因为他的为人实事求是,善于冷静分析。他又特别具备写史的客观条件:他是老北大毕业,和民俗学发源地有血缘关系,他当时又是少有的在京驻会(中国民俗学会)民俗学专家,且又在编刊及做组联工作。他可以借助职务上的方便,更好地结识“五四”时期老一辈专家,摸清历史情况,掌握更多第一手资料。果然,他充分利用自己这些有利条件,有计划地走访于前辈专家之间,从他所发表的“人物志”、“学术志”等有关短文,我们知道他和老一辈专家容肇祖、常惠、杨成志、江绍原、顾颉刚、钟敬文、杨堃等人结下了忘年交,他以恭谨有礼的学生、后辈身份,向他们请学问史,得到他们热情的帮助和指点,他也如实记录他们出于爱国主义动机的诸项学术活动,记录他们的家世、学品、著作和学术活动。他也在他们的启示下饱览了“五四”时期一些重要民俗学著作。此时我们不但在刊物上时常读到他所写的简短有味的“人物志”,也更惊奇他连照片、手迹、实物也搜集齐全了,这些,都给未来的“史”,留下美好的悬念,了解了他为写史所作的充分调查,从“活标本”身上所做踏实

序

中 国
民 俗





而深入的抢救工作,从而令人肃然起敬。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王文宝不想垄断他所得的“五四”民俗学著作的精华为己有,他在八十年代初学术春天来临之际,首先把这些资料编选为《中国民俗学论文选》,其中也包括了“文革”开禁后有代表性的篇章,此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大家都不会忘记,那正是民俗学得到社会承认而专业人员又急于渴望民俗知识武装头脑的时代,王文宝编了这本书,给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学科范本。这些范文也正是他写“民俗学史”的高级素材,这种利己利人的两兼工作,做得那么及时而实惠!只要我们注意其后各省(如浙江、云南、江苏)争先效尤地编选出自本省的“民俗学论文选”相继出版,就可以看出王文宝未史先文的重要意义了。

有时在学术会议上,我们也常见王文宝交上的论文,别开生面,短而有据,一言中的。2001年1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国际民俗学学术会议上,王文宝提交了《中山大学民俗学的十二个第一》,其中的头一条就是:

(一)1927年上半年,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在广州中山大学首开了“迷信研究”(民俗学)课,并留给我们他所判的5份试卷及其他有关珍贵手迹,这是我国民俗学讲授课程的第一批文物实证。这份资料帮中山大学补写了校史,也改写了民俗学史。(会上王文宝把这5份考卷交给了中山大学的叶春生教授,还举行了严肃简单的接交仪式)

其后的几个“第一”,也是新知识,新概括:

(二)1927年11月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民俗”命名的学术组织——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四)顾颉刚与余永梁共同制定了我国的第一个民俗学会计划。

(六)容肇祖为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的第一任主席。

(八)1928年3月21日创办了第一个以“民俗”命名的《民俗周刊》(以后又出了《民俗》季刊)。





(九)以民俗学会的名义出版了迄今为止最多的一批民俗学丛书,计36种。

当地的民俗学活动,培养了容肇祖、钟敬文、杨成志、娄子匡、杨堃、罗致平等数十位著名民俗学家,给我们留下了民俗学试卷、民俗学丛书、刊物等书面遗产……广州中山大学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活动,对以后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原文载叶春生主编《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这都说明王文宝在以各种形式书传写史,是他的“民俗学研究史”的一部分。同样他也可以写出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十二个第一、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后的二十四个第一,等等。

可以想见,这部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文献、实物、图片、表章所写的第一部民俗学研究史的生动文本,是我所知迄今为止,开中国近代民俗学史先河的权威之作。以王文宝数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科学态度所精心撰著的这部学术史,内容丰富、材料翔实、体例严谨、立论公正,能立足于伟大时代的前沿,反映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浩瀚精深。不只写出权威人士的贡献,也突出了民俗学“民”之本意和群体性的特点。他不崇势、不媚俗,科学立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新时代产生的一种新学科——民俗文化学的深厚根基及其在斗争中成长的强大生命力。

本书写成之后,尚能三易其稿,统观全局,不断增评学界新著,提高研究水平,务使达到科学论史,导向鲜明,可谓论史之忠于时者,其书必流播久远,广为传诵,是为序。

2002年8月

序

中 国
民 俗

注:作者是资深教授、中国著名四大女民俗学家之一(其他三人为郭立诚、潜明兹、马昌仪)。





中 国
民 俗

中国民俗研究史

序

——研究史——学科深入发展的关键

叶春生

大家都记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前叫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凸现着“研究”的招幌,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概是觉得“研究会”书斋味太浓,或者是没有个“家”不够“威”,才改为现名的。1958 年,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制定的工作方针也赫然写着:“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研究”在科学发展中也占据着四分之一的江山。再看得远一点,如果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从 1918 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开始的话,那时征集歌谣的目的,一为文艺,二为学术,这“学术”二字,指的就是研究。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以后,一直遵循这个传统,出版《民俗》周刊,编撰了许多研究专号和丛书,在学科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我国民俗学史研究的专门家,王文宝先生在这块领地上辛勤耕耘,已出版了两部专著:《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和《中国民俗学史》。如今他的《中国民俗研究史》又即将问世,我们研究领地又增添一部力作,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

过去不少人误认为,我国的民俗研究起步晚,较之于英美民俗学家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民俗,晚了一个世纪,其实不然。王文宝先生的《中国民俗研究史》告诉我们,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杨孚





的《异物志》中,就收有不少神话、传说、歌谣、谚语及有关民俗事象,并用以观风察俗,辅助政治;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亦收有不少神话传说及风土人情;明冯梦龙的山歌理论;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李调元《粤东笔记》、黄遵宪的山歌题记、李光庭《乡言解颐》所及,不但歌谣谚语、乡土风情,且夹叙夹议,高论叠出,独到精深,不过他们多从文艺学方面入手,重在分析这些口头文学作品的内容及其风格,语言特点,流传方式,与受众的关系等,有别于欧美学者的研究方法,其实这就是中国民俗研究的特色。他们是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民俗事象的。后来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吴歌小史》,周作人的《童话略论》、《中国歌谣的价值》,钟敬文的《蛋歌》序言、《客家情歌集》引言,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民俗研究中独树一帜。杨成志先生称之为“人文学派”。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我国的民俗研究不是比欧美晚一个世纪,而是早好多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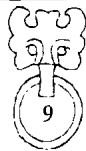
话说回来,造成这一错觉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研究史的系统梳理。现在好了,王文宝先生的《中国民俗研究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楷模,标志着本学科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本民族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弘扬民族传统至关重要。许多发达国家都把民族传统当作一个国家历史地位的证明,这就是民俗文化史研究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愿与各位同仁共勉,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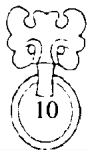
2002年7月28日

注: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博士生导师。

序

中 国
民 俗





序

宋兆麟

王文宝先生继《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 1995 年)之后,又推出了民俗学史新著《中国民俗研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可喜可贺,是为之序。

文宝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学长,毕业后为了民俗学走到一起来了。文宝先生是在坎坷的道路上走过来的,20 世纪 50 年代遭到不公平待遇,90 年代初在职称上又遭到不公正的处理,这些挫折给他带来不少打击。然而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为了心爱的民俗学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灯下苦读,走访调查,积累资料,探索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改革开放后他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为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同时著书立说。历史告诉我们,有投入就有收获,厚积薄发,现在迎来了他的丰收季节。就以民俗学史研究而言,王文宝先生的著作一本比一本深入,水平一本比一本高。这一课题不仅是民俗学的基础研究,涉及理论方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类组成了人类社会、有关复杂而有序的人际关系,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史前时代主要是以风俗来维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维持社会关系的因素就增加了,有王权、军队、监狱、法律、礼制、道德,但民俗依然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支柱之一。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重视采风、调查民俗,并且充分发挥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号称有五





千年文明史,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这同中国民俗文化的深厚根基是分不开的。奇怪的是,近现代的政要对民俗文化却淡忘了,加上民俗学科本身的某些不足,使民俗学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有不少有识之士却锲而不舍、埋头苦干,为民俗学园地耕耘不止,王文宝先生就是可敬的一位。

《中国民俗研究史》有不少优点:

首先是从史实出发,论从史出。大凡治史的人,都是以史实为根据的,而不是唯意志论。文宝先生根据古籍、物证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民俗研究的发展史,更为可贵的是,文宝先生与老一代民俗学家钟敬文、常惠、杨堃、杨成志、江绍原来往甚密,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如中国民俗学的早期活动,就是文宝先生讲清楚了,且有实物为证。

其次,自1979年以来,文宝先生就积极参加中国民俗学会的筹建工作,后来又一道是学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又是一位见证者,由当事人写这段学术史,更加准确、生动。

此外,该书约有160多种二百多幅罕见的照片,介绍了四百多位民俗学者,还有20世纪大事记等,这些资料使该书增辉不少,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注: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序

中 国
民 俗





序

曲彦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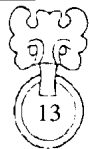
我在一个民俗学会议上的发言里谈到,曾经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中国民俗学,迄今已经走过了 80 多年的历程。“文革”后学科的重建,也已经 20 多年了。宏观者暂且不言,总结这个时代的民俗学学术史,既是对逝去时代的一种纪念,同时也是迈入新时代的重要铺垫,这也是时下中国民俗学者的学术责任之一。王文宝先生即将印行的《中国民俗研究史》,可谓“生逢其时”。

在中国学林的百花园里,作为历史和“阅历”尚浅,尚未很熟稔丰满的一个细微学科的中国民俗学,是否也有必要像其他众多“显学”那样写作专门的学术史?虽说我不治民俗学史,但这是我持肯定观点的同时又以“逆向思维”方式反诘自己的问题。我从梁启超那里讨得了相关的“说法”。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是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方法的著名专著。在谈到作史的目的时,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补编里又写道,“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我想,这也当视为中国民俗学作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在受西学“强烈影响”之前的中国学术史上,曾有过《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梁氏此书,没有突出如何研究学术史,但其治史的学说,亦可视为治学术史的基本规范





则例。民俗学史亦不例外。中国民俗学学科重建 20 年来,有一支笔书写了三部中国民俗学史,这就是出自著名民俗学家王文宝先生一人笔下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和即将印行的这部《中国民俗研究史》。三部中国民俗学史,在时间的下限上分别为截止到 1983 年、1994 年和 2002 年,后两部的间隔大约可谓“十年磨一剑”。尤为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是,不仅这三部民俗学史均出自王文宝先生一人笔下,而且,第三部乃是文宝先生以年逾七秩的高龄一挥而就,勘谓“老愈弥坚”,老而笔犹健。不是么?《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出版于他 58 岁时,《中国民俗学史》是他 66 岁时出版的,而今这部《中国民俗研究史》则出版于他 73 岁之际。如果说中国民俗学近 20 年的迅猛发展是“大器晚成”的话,那么,王文宝的民俗学史研究成就,亦可谓“大器晚成”也!

文宝先生三部中国民俗学史的相继问世,可谓“各适其时”。第一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于 1987 年出版,首次系统地回顾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历史,适应了中国民俗学学科重建的需要。1995 年,《中国民俗学史》出版,则以较大的篇幅梳理评价了中国民俗学学科重建以来的发展概况。而今这部《中国民俗研究史》,便是以“重建”之后的近 20 年中国民俗学学术水平和眼光,全面回顾、总结、评价中国民俗学 80 年的学术史。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环环相扣,循序渐进。

唐代史官刘知几曾提出,“史才须有三长”,即“才也,学也,识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乃强调,治史者要具备史德、史学、史实和史才“四要素”。“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至于“史才”,则是“专门讲作史的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因为,“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这些,也可以用来作为评价王文宝先生这部《中国民俗研究史》的切入视点。

先从“史德”说起。章学诚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



何？谓主书者之心术也”。客观、公正，即“史德”。梁氏所谓“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实质上关注的是作史者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科学、客观地再现和评价历史。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充分地占有第一手的历史材料。作为史家，占有资料的目的，在于客观地再现历史。可喜的是，王文宝自 1979 年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做组联工作之后，就投身于中国民俗学学科重建的前期准备工作之中，一直到今天。当年，他一方面积极联络常惠、钟敬文、杨成志、杨堃、江绍原和容肇祖等“五四”运动以来的老一代民俗学家，酝酿发展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仅 1981 年，就先后组织了民俗学座谈会，发表《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民俗学而努力》倡议书，先后编印了《中国民俗学论文史料选编》和《中国民俗学目录选》。由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中国民俗学论文选》（1986 年）。在始终参与中国民俗学会筹建的同时，他广泛与前辈民俗学家们交往，细心收集、抢救有关以往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资料，第一手资料积累之雄厚，难得第二家。例如，当他收集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同人合影的两幅珍贵照片，就是由已故杨成志先生十分清楚地为他一一指认出了照片上每位的姓名，为后来撰写中国民俗学史占有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在抢救老一辈民俗学家著述过程中，他还亲自为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编辑出版了《古俗今说》和《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作为中国民俗学学科重建的骨干参与者，他还是十分活跃的民俗学事业的活动家。其间，他与各地不断涌现的中青年民俗学者建立并保持着广泛的联络，其自身就是一位中国新时期民俗学运动的直接见证人。凡此种种，撰写中国民俗学史，王文宝的“史德”可谓难得的完备。

次说“史学”。梁氏说的“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是指治史要懂治史的学识和方法。学术史不仅要如实记述，更需评论，在评述中展现、还原历史。王氏笔下的三部中国民俗学史，尽管评的成分显得单薄一些，但总体上还是以评述作为方法。尤其是这部晚出的

